

从“开卷有益”到“开卷警惕”

□魏建(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)

我的阅读经历实在太平凡,和同龄人差不多。如果说有那么一点不寻常的话,那便是我年少时曾经对书饥不择食,而今天却对读书时时警惕。

我7岁多就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文革”以前,我接触最多的书是街头的小人书摊。那时我经常到小人书摊上租书读,好几本连环画一层一层地排着,每一层用绳子一拦,很简陋,也很便宜。租小人书的摊儿往往摆在人口稠密的集散地附近,比如在电影院、戏院门口。很多小孩都是在这里租小人书看。倘若谁家有小人书,我们就去他家看,或者互相借来借去,往往是看过了上册,却怎么也找不到下册了。

“文革”一爆发,书突然变少了,能读到的只是有限的政治读物。那些极左的读物让我们的思想变得贫瘠而僵化。在这些读物的影响下,我和我的同学们好像只会写政治化的理性文字,不太会写比较感性的抒情文章。当时我本人的思想就僵化得很。1977年夏天,社会上都在疯传可以凭考试成绩上大学了,很多人开始准备,可我就不相信这会是真的。直到收音机都播出了,我听完第二天还找来报纸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。

我开始准备高考时已是1977年的深秋。那时想找到跟考试有关的书简直是不可能的,因为图书馆、新华书店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书,更不要说考试用书了。我当时见到的跟高考有关的东西是几张像传单一样的模拟试题。那些试题竟是用不同颜色的纸印刷的一套试卷,红的、绿的、黄的都有。大概是纸张匮乏,印卷子的人找到什么纸就用什么纸印。我在考试前总共见过这样的三页纸,还不知道已经转了多少人之手。我高考前经常阅

读的一本书,是《新华字典》。我找不到教材,就靠看《新华字典》学语文。

要说我小时候有什么让我迄今难忘的读物,那要说到《小朋友》杂志。我刚上小学不久,曾外祖母患病,我只能休学在家照顾她。我陪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孤独无聊,于是《小朋友》就成了我儿时最好的伙伴。《小朋友》里有童话、寓言故事、漫画,还有别的小朋友画的作品,还教唱歌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期都有张乐平画的漫画。在那个年代,是《小朋友》让我充实、让我快乐、让我产生了读书上瘾的感觉。

我小的时候,书很少,偶尔接触到的书真的是开卷有益。而今天,想“开卷有益”太难了!现在是书多但好书少。在图书商品化时代,好书少,坏书、劣书、伪书、庸书却很多。所谓“坏书”,轻则教人投机,重则让人“中毒”;所谓“劣书”,是指半文盲写的劣质书和盗版书;所谓“伪书”,就是假书,如冒充名人出的书,或是假冒引进版的书;所谓“庸书”,就是阅读价值很低的平庸读物。

今天不能盲目地说“开卷有益”,而应说“开卷警惕”,就像提防食品安全一样。假使你能看出有毒的坏书,你能鉴别出盗版书吗?假使你能鉴别出盗版书,你能躲得过冒充好书的伪书吗?即使你侥幸躲过了一些半文盲写的劣质书或盗版书,但你躲得过铺天盖地般的平庸

庸的读物吗?就算这些庸书没有伤害你,但它们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,怎么能说“开卷有益”呢?对于今天热爱读书的青少年,我们真的应该告诉他们,要慎重选择自己要读的书。

那么,哪些是好书呢?我在上大学时,曾找到一本“文革”前出版、已经没有了外皮的《辞海》(文学分册),做我选读书籍的“引子”。我相信能进《辞海》的书,那自然是好的。今天回想起来,如果说当时谁帮我选了一些好书,那就是《辞海》遴选出的经典著作。

等我有孩子了,图书馆里、书店里和网络上的书多得让人应接不暇,想挑出一本好书很不容易。于是,我只能选择经典名著。可是,孩子有逆反心理,你推荐的,他反而不读。我是研究文学的,我推荐给他的文学经典名著,几乎都遭到他的拒绝或是讨价还价的应付。无奈,我只好骗儿子读书。比方说,他上初二时,我想让他读《围城》,便对他讲:这本书非常好,但是你现在还读不了它,只有等你上了大学才能读。结果,你不让他读,他当天就拿到床边去看了。过了几天,他写了一篇记录

的突泉枯水后又喷涌的作文,名字叫《重生的梦》。文章第一句是:“梦,就像一台陈旧古老而又孩子气十足的闹钟,时走时停,时快时慢,没有它不行,相信它又不准。”这便有了钱钟书语言的味道了。

什么是经

典之作呢?应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权威性优秀作品。把这句话里的三个关键词摘出来,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:“优秀”就是好作品,“权威”就是公认的好作品,“长久生命力”就是古人和今人都公认的好作品。

哪些是经典之作呢?历史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名作当然是经典。比较麻烦的是现当代作品,特别是刚问世不久的新作。这些作品没有经过跨时代的筛选,不知哪些能成为后世的经典之作。

比如,鲁迅先生的作品曾经在语文教材里有很多,近年来的语文教材出现了“鲁迅作品大撤退”。对此,社会上议论纷纷。声讨者有之,赞赏者有之,宽容者有之,观望者更有之。我提倡语文教材中应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注入,但我还是力挺鲁迅的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。因为我觉得鲁迅的优秀作品一定能成为经典。虽然鲁迅的作品还不到百年,没有经过“长久生命力”的检验,但是鲁迅的优秀作品具备了中外文学经典的所有基本要素。其一是它的文学原创性,其二是它的时空超越性,其三是它丰富的可阐释性,其四是它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符号性。至于鲁迅作品较为深奥是否适合中学生阅读的问题,我推荐王富仁教授的一篇文章《最是鲁迅应该读——关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几点思考》(《中国教育报》2001年10月25日第5版)。这篇文章不仅回答了这一难题,而且道理讲得特别透彻,值得中学语文教师和家长认真阅读。

至于如何为孩子们选择当下新书,我的态度是,一般不推荐,爱读不阻拦。例如《哈利·波特》就是一本让人读得走火入魔的书,外国孩子喜欢,中国孩子也喜欢。这就是公认的好书,我们为何要阻拦孩子们读呢?



碎碎念

“咱们的雾霾”

□安立志

央视前主持人柴静拍了一部关于雾霾调查的纪录片《穹顶之下》,影响很大。贾樟柯导演的电影短片《人在囧途》却没有大有人看,近日只看到他发的一条微博,“去年拍环保广告,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,高声嚷嚷:‘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,快把摄像机扣下来’。也很恐怖。”

看了这条微博,我也感到很恐怖。不过,我恐怖的不是大妈大爷的冲动,而是他们对“咱们的雾霾”的维护。

“咱们的雾霾”只是表明所有权,要害在于“他们在拍”这个动作。贾樟柯团队拍摄环保广告,呼吁人们保护环境、减少污染,是一件好事,为什么这些大妈大爷要“快把摄像机扣下来”?

一个城市雾霾肆虐,只能是当地市民的祸患,不可能是福音。只是这“雾霾”一旦与“咱们”相联系,似乎就牵涉当地人的脸面与这个地方的声誉。于是“家丑不可外扬”就成了硬道理,这或许正是这些大妈大爷断然制止拍摄的心理因素。

这些大妈大爷扮演了奇怪的角色,他们本是雾霾的受害者,却成了雾霾的捍卫者。置身毒雾尘埃之下,莫非真的“久居鲍鱼之肆,而不闻其臭”?

鲁迅先生经常提到清朝的故事。清军入关后,“金钱鼠尾(满人发型),乃新朝之雅政;峨冠博带(汉人装束),实亡国之陋规”,明朝遗民一下子面临着“留发”还是“留头”的生死选择。抵抗、流血,最终屈服,终于习惯了200多年的“猪尾巴”。清廷坍塌,清帝退位,一当革命军要求剪辮子,反而惶恐不已,似乎失去辮子便无颜面对祖宗。

近年来,雾霾肆虐我国北方一些城市,并且越来越被人们重视,人们也意识到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。PM2.5只是检测雾霾的数值,而且还曾被视为舶来物,怎么转眼间却成了“咱们的”?如果把“咱们的雾霾”也视为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(受害者维护加害者,受辱女爱上强奸犯)有点儿勉强,不过,这雾霾的确很像汉族人头上那条“猪尾巴”。

鲁迅先生曾针对某种国民性作过如下比喻:“譬如病人,患着浮肿,而讳疾忌医,但愿别人胡涂,误认他为肥胖。妄想既久,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,并非浮肿;即使还是浮肿,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,与众不同。”(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)

雾霾也是如此,人们都知道雾霾对身体健康有害,因为是“咱们的雾霾”,也就与众不同,于是就成了“发展的产物”,并特意指出外国也曾如此。

所有的坏事、丑事,如同浮肿一样,一旦成了“咱们的”,不仅不可外扬,而且成了好事、美事;即使属于家丑,也要捍卫家丑、维护家丑,不许外人置喙,从而形成了极力为家丑辩护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谁要对“咱们的雾霾”有异议,谁要说外国天空多么蓝,空气多么好,马上斥之为:“有本事你移民!”这应了鲁迅先生近百年前说过的话:“即使无名肿毒,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,也便‘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’。”

“咱们的雾霾”也是雾霾,如同“咱们的癌症”也是癌症、“咱们的贪官”也是贪官一样,决不会因为这些都是祸害是“咱们的”,因而成为“好癌症”或“好贪官”。只有承认问题、认识危害,群策群力、努力治理,才能解决问题、消除危害。



名言言

“官本位”的资历

计划经济时代,却是大大低估了它的“资历”。

中国的官本位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,不断发展与完善的。

流传千余年的《神童诗》,以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,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四句开篇。前两句不少人记不清了,后两句却是谁都记得的。但我以为,所谓“唯有读书高”,其实是可以解读为“唯有做官好”。“读书”方能做官,读书方能成为天子所重的“英豪”,“读书做官”这四个字相当精辟地提取了它的精义。这几句诗,据说出自宋代汪洙之手,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。

那个时代,“仕途”之外,别无他途。说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千钟粟”,也只有通过做官一途方能实现。

官本位体现于官与民的关系,当然是官为重,民为轻。

因此,当官的自称民之父母,或曰“父母官”;当官的出行要鸣锣开道,黎民百姓必须肃静回避;当官的问事高高在上,黎民百姓答话必须下跪叩头——他们没有级别,但没有级别也是级别,属于最低一级。

官本位体现于官与官的关系,则是等级森严。哪一级的官排在哪一个位置,享受哪一种待遇,以至穿哪一种颜色的官服,坐哪一种规格的轿子,都有明确的规定,不可有丝毫的马虎。官大一级压死人,连有理无理也按官衔大小去定——当官的总是有理,但相对大的只有相对真理,绝对大的才有绝对真理。

官本位的种种现象,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,都可以找到它们的滥觞,包括用官衔当做奖品:

东汉时山阴陈器,虽无建功立业之举,又无经济济世之才,却因“渔则化盗,居则让

邻”——堪为文明市民,道德楷模——七十岁时由刘向、扬雄推荐,被汉成帝特以公车徵为大中大夫。这个“大中大夫”的官衔,就是一种奖励。

唐代李希杰、李怀光相继反叛,刚当上皇帝的李适在逃难途中口干舌燥,恰好有民上献瓜果,李适感动之余金口一开,便授于此民以“散试官”的官衔。对此,跟随他的大臣陆贽颇有非议,但李适认为“试官虚名,无损于事”。这个“散试官”的官衔,也是一种奖励。

当然,官本位的本质是权力本位,一旦失去实权,官衔再大也没用,这也是自古皆然的。用官衔当做奖品,确实也只是“一种‘荣誉’职务”。

倘若官本位只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,那事情恐怕就没有那么复杂,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远去,官本位也会逐渐消失。

令人遗憾的是,官本位的意识,偏偏如此源远流长。



□宋志坚

有学者称:“所谓官本位是指在计划经济时代,形成官农、官工、官商的官本位体制,国家垄断一切资源,无所不能,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众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。”

官本位在计划经济时代,或许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,但是,说官本位“形成”于